

JIANGSHI FUZITAIWAN

# 蒋氏父子

◎ 李松林 著

## 在台湾



# 蒋氏父子在台湾

JIANGSHIFUZIZAITAIWAN

◎ 李松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氏父子在台湾/李松林著.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1. 4

ISBN 7 - 5057 - 0670 - 5

I. 蒋… II. 李… III. ①蒋介石(1887~1975) - 生平事迹②蒋经国(1910~1988) - 生平事迹

IV.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816 号

|    |                                       |
|----|---------------------------------------|
| 书名 | 蒋氏父子在台湾                               |
| 作者 | 李松林                                   |
| 出版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发行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经销 | 新华书店                                  |
| 印刷 | 北京管庄永胜印刷厂                             |
| 规格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br>22 印张 507000 字 |
| 版次 | 2001 年 5 月第 2 版                       |
| 印次 |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印数 | 1 - 3000 册                            |
| 书号 | ISBN 7-5057-0670-5/G · 42             |
| 定价 | 34.50 元                               |
|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
| 邮编 |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

## 前 言

对于蒋介石父子在大陆时期的活动,人们知之甚多,然而对其偏安台湾后的活动,却了解甚少。笔者多年从事中国国民党史与台湾问题的研究,搜集了有关蒋氏父子在台活动的大量资料,写就了这本《蒋氏父子在台湾》。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蒋氏父子在台活动,时值此书再版之际,笔者将过去发表的两篇关于蒋介石与蒋经国在台湾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的文章放在该书正文前面,代为前言。

评价历史人物的关键,是看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推动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根据此一标准,评价大陆时期的蒋介石,国内学者总体看法是:蒋介石是一个基本被否定的人物。

纵观蒋介石晚年在台湾的所作所为,其对历史的作用则充满了二元色彩,这种二元色彩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第一,蒋介石退台后认真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但其论点多属偏见与谬误。

蒋介石遭兵败大陆的沉重打击,退台之初整日闷坐室中,在“兴叹英雄末路悲怀”之余,也对其在大陆失败进行认真“反省”。例如他认为:国民党在大陆遭到惨败,最重要之原因在于“军事崩溃”与“党务失败”。军事崩溃主因在于“军队纪纲的败坏”和军队“对三民主义的动摇”,以及“官兵对立”、“军民脱节”。党务失败则是由于党员对“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与党内派系纷争,“失败主义心理”也是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

蒋介石“反省”失败并承认错误,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国民党亡命

海岛的特殊环境之下,以此能够笼络人心。当然蒋介石也想在接  
受大陆失败教训中,学越王勾(勾)践“卧薪尝胆”;学孙中山,重新改造  
国民党与军队,从头做起;学克劳塞维茨,来一个从失败中反转过来  
打败“敌人”的创举,以完成其“反攻大陆”的“神圣使命”。蒋介石复  
“总统”职后的所作所为,为上述分析做了进一步说明。

蒋介石的“反省”与当时国民党内滋生的忧患意识相结合,为其  
改造国民党与军队及整顿社会秩序、制止通货膨胀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透视蒋介石“反省”,可看出他的论点多属偏见与谬误。

例如,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政治原因是“新旧制度脱  
序”与“政党政治的失败”。这一论点显然是错误的。其错之一,此说  
旨在为其政治失败寻找理论根据,实际是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反对  
民主政治所造成的必然恶果;其错之二,此说掩盖了国民党挑动内战  
的事实,抹煞了国民党内战方针招致全国各党派各界民众的反对而  
引发政治失败的正确结论;其错之三,此说在为国民党政治腐败与内  
部争斗的事实开脱,事实上,正是国民党政治腐败与其独裁内战路线  
相结合,才构成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政治原因。

再如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经济原因是通货膨胀导致  
经济崩溃。即他认为中共与苏共联手阻挠美国对中国的贷款和中共  
破坏军队复员导致军费不减,以及宋子文的错误财经政策。依笔者  
之见,国民党在大陆崩溃的经济原因,一方面是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导  
致军费骤增,生产力遭到破坏而引发通货膨胀;一方面是官僚资本的  
巧取豪夺与垄断,使工农业遭到破坏与商业混乱;再一方面是国民  
党政权始终拒绝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因而遭到中国 80% 人口的强烈  
反对。因此,经济崩溃成为一种必然。

又如,蒋介石对军事失败的原因分析仅是表面现象,始终避开战  
争性质与人心向背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并将军事失败归咎于马歇尔的  
瞎指挥,这种说法显系为自己应负的责任开脱。

第二,在政治上,蒋介石在台统治比大陆时期更独裁,但却标榜

“民主”、“革新”。

蒋介石病逝后,台湾亲蒋派在神化蒋介石时,宣称蒋介石“把一个习惯了数千年帝制的中国社会,带入了世界现代民主国家之林”。众所周知,蒋介石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其南京政府开张后不久颁布的《训政纲领》中,就规定了实施以党代政的一党独裁式统治。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总裁制,蒋介石成为总裁,使国民党独裁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给予人民的只是“欲以内战的手段,削平中共和一切民主力量”,达到“维护自己独裁统治的目的”。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蒋介石为了维持蒋家小朝廷在台的偏安局面与一己私利,其统治则比在大陆时期更为独裁专制。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其一,在台湾全岛实施军事戒严体制。蒋介石根据“戒严法”在台湾全岛实施“戒严令”。此令直至1987年解除,戒严时间长达38年之久,开世界之先例。在军、警、宪、特“铁桶式”戒严体制的统治之下,台湾人民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统统被禁止与取缔。

其二,学袁世凯做终身“总统”。根据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一手操纵并经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如果再度连任,即属“违法”行为。蒋介石既要当“总统”,又要避开“违宪”的嫌疑。他首先批准选举他当“总统”的第一届“国大代表”继续行使职权至次届“国大”依“法”召集开会之日止。然而第二届“国大”何日召开是个未知数,这一举措就使追随蒋介石到台的“国大代表”全部成了“终身制”,开所谓“中央民意代表”延长任期所未有的先例。台湾各界对蒋的这一举措非常不满,讥讽这些代表为“万年国代”。其后,蒋介石又令“大法官会议”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这样一改,既坚持不修“宪”,又使蒋介石连任不违“宪”,根据这一荒谬举措,蒋介石连任五届“总统”,最后死在任上,时年89岁。

其三,传位于子,实行“家天下”统治。蒋介石在退守台湾重登宝座后的最大愿望,除了“反攻大陆”之外,就是传位于子。随着蒋介石年岁的增长,这种愿望越发迫切。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他首先让蒋经国掌管军特实权,后出任“国防部长”,使军事系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蒋介石有兵就有权观念的突出体现。另一方面让蒋经国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和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指挥派遣。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借国民党改造之机把蒋经国拉进国民党决策圈内,成为 16 名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之一员。在国民党改造宣告结束的国民党“七大”上,蒋经国又被其父提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为以后登上“党魁”宝座奠定了基础。1972 年蒋介石又提名蒋经国组“阁”。至此,蒋经国在蒋介石的导演下成为台湾名副其实的党政军核心人物,父子俩主宰了台湾的命运。

其四,为实现“家天下”统治不断铲除异己。早在大陆时期,蒋介石为了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曾将政敌汪精卫逐出决策圈,尽管后来汪、蒋再度合作,但蒋始终不能见谅于汪,对他多方排挤。对于与他在宪政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的国民党另一领袖胡汉民,他竟将其软禁于南京汤山。对于他的金兰义兄冯玉祥,利益一致时称兄道弟,一旦与他意见相左,立即翻脸无情,甚至不惜追杀之。退守台湾孤岛之后,蒋介石为维持蒋家小朝廷的偏安统治,在台发起长达两年多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并借改造之机将反对派统统挤出决策圈。如大陆时期党政军界的显赫人物阎锡山、何应钦、孙科、朱家骅、白崇禧都被逼下马来,解除印绶,打入冷宫。对于为蒋家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主持国民党党务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连个有名无实的“中央评议委员”头衔都不给。陈果夫 1951 年 8 月愤愤而死,陈立夫被逼远走美国养鸡度日。就连蒋的连襟和他的大舅子孔祥熙与宋子文也与他分道扬镳,远赴大洋彼岸做了寓公。为了蒋家小朝廷“长治久安”,蒋的原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于反对蒋经国的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和时任“参谋总长”的孙立人,蒋介石不惜将吴驱逐出岛,将孙长

期囚禁,做了张学良第二。后又下狠心罢免“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统”、“副总裁”陈诚的“阁揆”之权。

由于蒋介石在台统治比大陆时期更为独裁,因而使台湾民众的各种权利均被剥夺,民主进程遭到破坏。但这一专制统治在国民党退台初期,又为暂时的乱中求稳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国民党度过难关起到了保障作用。当然,这种作用是暂时的,正是由于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引发了蒋介石身后一波又一波的民主运动,最终促使国民党在台统治由独裁专制走向“政党政治”。

蒋介石在实施独裁统治的同时,又标榜“民主”、“革新”。首先,蒋介石在台湾推展“地方自治”,并于1950年4月正式颁布了《各市县实施地方自治纲要》,提出调整行政区域,健全地方基层组织;民选县市乡镇长和村里长;建立“民意机构”等。蒋介石此举是为缓解国民党当局与地方势力的矛盾所采取的一种安抚政策,其目的一是使地方势力纳入国民党政治运作的轨道,以利加强独裁统治;二是适应“反共抗俄”总动员需要,以建立“反攻复国”的社会根基。

其二,蒋介石在总结兵败大陆原因时,认为国民党和军队对三民主义信仰发生动摇是其重要原因,从而提出“建立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蒋于1950年8月在台湾全岛展开了规模庞大的国民党改造运动与“革命实践运动”。蒋的两项举措不仅整顿了各级组织,完成了上层权力再分配,而且对于稳定政局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的确,国民党改造就成了存亡续绝、起死回生的转折点。60年代,他又倡导“党务革新”,提出“首先在思想上、观念上、生活上、行动上、作风上,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一齐切实革新”。此番“党务革新”,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就是为适应“建设台湾”与“反共复国”的需要。说穿了,就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口中的“民主”与“革新”不过是独裁专制的挡箭牌而已。

第三,在经济上,蒋介石推展土地改革与新经济政策,但其中心点在于奠定“反共复国”的基础。



蒋介石兵败退台之初,立即在台湾全岛推展土地改革工作。众所周知,蒋介石在大陆统治 22 年,始终未在中国大陆真正开展土地改革运动。那么他何以一到台湾便大张旗鼓地推展土地改革运动呢?据蒋介石自己称:我们目前进行的“反共抗俄”战争“乃是以民生主义为重心的”,而实施民生主义的起点就是开展土地改革。而实际上他推展土地改革的原因不外以下三点:

其一,是为解决退台后的生机所被迫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国民党退台后,为了维持蒋家小朝廷在台统治,必须解决生机问题。而解决生机的关键,是缓和农村阶级矛盾,提高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促进台湾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稳定政局。

其二,是为了抵消中共在大陆开展土地改革的影响,与中共相对抗。蒋介石在 1952 年 4 月 21 日讲授《土地国有的意义》时宣称:“我们今后要以民生主义的‘均富’口号,和实践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现民生主义的行动,来作为粉碎朱、毛……‘共产’和其‘土改’的武器。”

其三,正如国民党叛逆者孙家麒先生所说:“因为地主全部都是台湾人,所以国民党可以大慷他人之慨,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毫无顾忌地认真推行。假如当日百甲以上的大地主,有三五个是属于皇亲国戚之流,我想台湾的土改工作,能否顺利推行成功,恐怕连陈诚先生也不敢做肯定答复的。”

对于蒋介石推展的土地改革,台湾社会舆论颇多颂扬。就台湾土地改革的实际情况观之,此举成功之处在于基本消灭了封建势力,使台湾农业迅速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并促进了台湾工业经济的恢复。但是蒋介石标榜的“耕者有其田”与中山先生当年倡导的“耕者有其田”有明显的差异,对地主利益照顾太多,仅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地权,远没有做到平均地权。

在推展土地改革的同时,蒋还提出要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模范省”,使其成为“光复大陆”后建设的蓝图。他提出:“要建立现代化国

家,除开加速科学化、工业化之外,别无其他方法可以俸致”。“所谓工业化,不仅是发达工业,同时还要使农业现代化”,“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来使我们的农业工业化”。台湾当局在币制改革和恶性通货膨胀得到初步控制之后,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遂提出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农工均衡发展”,实施“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台湾处于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这一战略使台湾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工业品的自给能力大大提高,为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发展和台湾经济起飞打下了基础。但由于岛内市场狭小,也出现了生产过剩和对外贸易发展缓慢等严重问题。

60年代初期,蒋介石在军事反攻无望的情形下,遂提出“建设台湾,反共复国”口号,同时将施政重点集中于建设台湾,经营台湾,以长期维持国民党在台统治。此点表明蒋介石已从50年代初期的“军事第一”、“反共第一”过渡到“反共复国”与“建设台湾”并重,更重“建设台湾”,以偏安台岛。台湾当局根据蒋介石指令与变化了的经济形势,提出“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即从发展内向型经济转向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拓展对外贸易,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此一战略实施的结果使台湾经济结构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使内向型经济转变为外向型经济,重工业得到发展。此一时期,台湾经济年增长率为10.37%,10年中有5年工业增长率超过20%。此一数字在亚洲地区少有,在世界范围也不多见。台湾经济的这种高速发展被外界称之为“经济起飞”。

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王牌”遂成为蒋介石反共和与大陆相对抗的新的筹码。蒋介石病逝后,蒋经国提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和李登辉的“民主、自由、均富统一中国”,都与台湾这张“经济王牌”有关。

第四,在军事上,蒋介石从极端的反共立场出发,将台湾社会推向反共、“反攻大陆”的极点。

蒋介石退守台湾之后,不甘心失败,从其极端的反共立场出发,采取了比大陆时期更为狂热的反共行动。每到一处讲话,每开展一项运动,其落脚点都放在“反共”上。“肃清匪谍”与“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自不必说,就连国民党改造与土地改革、新经济政策也以反共为最终目的。就在蒋介石病逝前一周,他在《告青年书》中,还声嘶力竭地要青年人“贯彻反共复国”的“大担当大使命”。与此同时蒋介石为加强反共心战,在 50 年代抛出了三大反共论著,即《反共抗俄基本论》、《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苏俄在中国》。这三部书的共同特点是:都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系统地攻击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蒋介石还在书中鼓吹培植以反共“新武德”为核心的所谓“革命人生观”,要求国民党官兵建立“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五大信念,与中共作战时“不成功,便成仁”。

蒋介石在狂热地鼓吹反共的同时,全力投入了“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蒋介石为了鼓吹“反攻”政治神话,早在 1950 年 5 月就开出了“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空头支票。为使“反攻大陆”成功,50 年代,蒋介石不断派飞机轰炸大陆沿海城市,派小股部队偷袭大陆沿海岛屿,致使海峡两岸不断发生炮战、空战。因“反攻大陆”始终未能兑现,蒋介石父子遂将“反攻大陆”改为“反共复国”,此调时高时低,但仍坚持不舍。

进入 60 年代,国民党再度鼓噪“反攻大陆”。1961 年 3 月 29 日,蒋介石在《告青年书》中再提“反共”面临新形势,是反攻的千载难逢之机。1962 年元旦,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提出“革新、动员、战斗”。同年 11 月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上根据蒋介石旨意提出三大任务,首要任务就是“反攻大陆”。蒋还对美国记者宣称:“一旦我们开始反攻大陆,我们预期少则三年,最多五年内,完成我们底定全国任务。”从 1962 年到 1965 年,蒋介石在台岛设立了“反攻”专门机构,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并派出多股军队与特务偷袭大陆。其间,蒋介石

石在赴金门考察时,还发起了“毋忘在莒”运动,梦想田单复齐故事重演。

蒋介石在退台后,特别是60年代初大肆鼓吹“反攻大陆”,究其原因除了蒋介石的极端反共立场与报复主义心理外,还有其他因素:其一,是蒋介石错误估计大陆形势所致。其二,蒋介石利用了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见分歧,认为国民党反攻,苏共将不会援助中共。其三,企图在台海造势,拖住美国。无论蒋介石怎样费尽心机,但其“反攻大陆”仍以破产而告终。蒋介石后半生倾全力从事“反攻圣战”之所以遭到可耻失败,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蒋介石始终不能审时度势,尽弃前嫌,实施两党合作方案,实现祖国统一。加之他对大陆形势的错误判断,其“反攻”行动不败才是怪事。其二,海峡两岸军事、经济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大陆时期,蒋介石控制着全国政权,掌握着几百万军队,尚且不是中共的对手。退守台湾之后,弹丸之地,军事、经济实力严重不足,虽后经整顿,实力有所改观,但“反攻大陆”实属以卵击石。其三,美国对蒋介石“反攻大陆”态度的冷淡亦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美国人是最大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扶蒋与弃蒋始终是以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得到保护为其根本原则的。并不是美国不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而是根本不相信他能够“反攻”成功。同时鉴于中国大陆的强大,美国希图从台湾海峡脱身,重新考虑对华政策,松动同中国大陆的关系。失掉了美国的支持,蒋介石的“反攻”就成了一句空话。

蒋介石狂热的反共、“反攻”宣传与行动,不仅使台湾社会对大陆认识产生负面影响,造成两岸敌对意识有所增强,而且为外国势力插手台湾事务与“台独”分子制造分裂提供了方便,在客观上阻碍了祖国统一的进程。

第五,在对外关系上,既全力投靠美国,又反对其分裂行径,坚持“一个中国”立场。

蒋介石能够在大陆统治22年,在台岛偏安26年,很重要的原因

在于美国对他的全力支持。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仅使美国改变了对台“观望”政策,而且使蒋介石意外获取了一张盖有美国总统杜鲁门印章的“人寿保险单”。

由于蒋介石拼命抓住美国不放,不仅使得美国在对蒋介石集团恢复“军援”的同时,还恢复了经济“援助”。当坚决反共的艾森豪威尔取代杜鲁门入主白宫后,一上台就打“台湾牌”,不仅取消了杜鲁门关于台湾“中立化”的声明,“放蒋出笼”,而且接受蒋介石提议,签订了台、美“共同防御条约”,从而使蒋介石有恃无恐,大肆叫嚣“反攻大陆”。

蒋、美之间,除了相互勾结之外,因利益不同亦有争斗。这一争斗突出表现在台湾归属问题上。

众所周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的领土,美、英、中三国《开罗宣言》也明文规定将日本侵占的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然而在蒋介石集团退台之前,美国就曾考虑将台湾与中国大陆分开处理的问题,并抛出种种分离台湾的方案。诸如在台培养亲美代蒋势力,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和“联合国托管”案。面对美国这种分离台湾的政策,蒋介石当时予以坚决抵制,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决不能交归盟国”。

1954年和1958年,由于美国政府纵容蒋介石集团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导致台湾海峡两度出现危机局面。美国人曾两度提出“停火”建议,但其目的—是阻止人民解放军进攻金门,二是迫使蒋介石减少或撤出金、马驻军,以换取中共同意不对台、澎使用武力。此举的实质是:分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美国分离台湾的行径,均遭到蒋介石的反对与抨击。蒋介石说,美国建议“停火”,是“企图在牺牲中华民国整个大陆之外,更牺牲我们的外岛”。他表示:提出“台湾地位未定”的人是别有阴谋地歪曲历史,而“两个中国”更是“荒谬绝伦”,“中华民国领土,绝对不允许割裂”。

蒋介石口中的“一个中国”当然是指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了的“中

华民国”。

既然蒋介石退台后全力投靠美国,何以又反对美国分离台湾的举措?其中除了蒋介石固有的民族主义立场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美、蒋在台湾海峡利益上不一致所致。美国协防台湾是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在远东发展,维护其在远东利益的考虑。蒋介石全力投靠美国则是出于维持蒋家小朝廷在台的偏安统治,并通过签约将其拖入中国内战,以便“反攻大陆”。但他反对美国分裂中国的立场是应该肯定的。

综观蒋介石晚年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他既有对台湾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的一面,又有阻碍历史进程的一面。就其积极方面而言,他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反省”,为克服弊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所推展的国民党改造运动,“革命实践运动”与“党务革新”,既有利于改善自身形象,又有利于稳定政局,更为蒋经国接班奠定了基础;他所主导的土地改革运动虽有不彻底的缺点与局限性,但它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与其促进经济现代化思想相结合,为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他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分裂,对中国统一有正面效应。就蒋介石阻碍历史进程方面而言,他在政治上坚持独裁专制统治,不仅与历史潮流相违背,而且剥夺了广大台湾人民集会、结社等自由民主权利,阻碍了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带有明显的反动作用;他坚持极端的反共立场,并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其举措不仅使两岸敌对意识有所增强,而且造成海峡两岸长时期隔绝,为外国势力插手台湾事务与“台独”分子制造分裂提供了条件,其行为阻碍了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总之,蒋介石晚年的所作所为充满了二元色彩。

与其父相比,蒋经国要开明得多。但父子二人亦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他到临死之际,始终坚持其父制定的“反共国策”,仍然念念不忘“光复大陆”。就此点而论,蒋经国的立场是反动的。当然,他与其父一样,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坚决反对“台独”主张。这一

点是值得肯定的。与其父不同的是,在“反攻大陆”无望的情形下,蒋经国非常注重经济建设,并将台湾从农业社会带入了现代社会,得到了台湾各界的好评。蒋经国在台活动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他始终坚持改革,特别是在其晚年,为了“向历史交待”,曾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革新。

对于蒋经国晚年“向历史交待”的内容,台岛内外舆论众说纷纭,多数人认为是指蒋经国晚年全力推行的“政治革新”运动。笔者认为此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所在,但并非全部反映蒋经国晚年在政治上的举措。笔者认为,蒋经国晚年“向历史交待”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改变接班部署。这是蒋经国晚年“向历史交待”的突出表现。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皇权统治的国家,虽然封建王朝早已被推翻,但皇权主义观念仍在中国有相当的市场。昔日有蒋介石传位于子,今日蒋经国虽比其父开明,但仍未能摆脱皇权主义的束缚,在接班人问题上也企图效仿乃父的传位于子部署。台湾当局一直否认此说,认为蒋经国晚年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构想是集体接班。笔者看法,此说混淆了蒋经国本意与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就蒋经国最初的想法看,他在接掌国民党中央主席和“总统”后,既定方针就是传位于子。关于此点可从下面事实中得到说明:

(一)使蒋家第三代逐步掌握党、政、军大权。在蒋家第三代中,长子蒋孝文重病在身,与政界无缘。长女蒋孝章久居国外,不过问台湾政治。最有政治行情的是其次子蒋孝武和庶出的章孝严。蒋孝武26岁担任辅导会顾问,兼任广播电台主任和广播事业协会理事长等职。自1976年始,蒋孝武又涉足情报工作。从历史经验看,台湾最有实权的机构是情治系统。蒋经国让蒋孝武抓情治机构与老蒋当年让蒋经国抓特务系统,可谓是异曲同工。再者,蒋经国还提拔章孝严出任“外交部”次长一职,企图让其接掌“外交”大权。

(二)清除蒋孝武接班的阻力。王升是蒋经国的心腹,多年来深

得蒋的重用。但由于王权力膨胀,为所欲为,遭到黄埔系与国民党元老派的反对。蒋经国也怕他权大欺幼主,故借党、军系统的“反王”声势,将王升外放巴拉主任“大使”。王倒台后,亲美的蒋彥士曾得宠,但蒋彥士对蒋经国的传子部署表现消极,很快也被逐出决策圈。

(三)成立过渡班底,显系为托孤。1984年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以来,蒋经国提拔的党政要员多是古稀之年的人物。例如俞国华、马树礼等。这些人特点除年龄大而外,均与蒋家有很深的渊源,既对蒋家绝对忠诚,又无自己的班底。蒋经国选中这些人正如同当年蒋介石选中严家淦。与此同时,蒋经国还开始起用第三代,其目的是使他們抓到实权,以便为蒋孝武接班护航保驾。

上述事实表明蒋经国的初衷就是传位于子。但在1985年底和1986年初,蒋经国毅然放弃“传位于子”部署,开始布置集体接班。首先他在1985年12月和1986年初,再次对记者公开讲:“将来‘国家元首’一职,由蒋家人继位一节,本人从未有此考虑。”又说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其后,外放蒋孝武任新加坡商务代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重新起用跟随他多年因“中坭”事件下台的李焕,后任命李焕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的目的是使李成为集体接班的重要班底成员,以掣肘“副总统”李登辉。与此同时,蒋经国还让其弟蒋纬国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一职,控制军、特实权。至此,一个“一蒋二李”(即蒋纬国、李焕、李登辉)为代表的集体领导班底已经基本形成。

至于蒋经国为什么改变接班部署,将在后面论及。

第二,大刀阔斧地推行“政治革新”运动,是蒋经国晚年“向历史交待”的核心内容。国民党退到台湾以来,为了维持在台湾统治地位,曾多次进行政治改革。然而历次改革无论就其规模、范围,还是就其深度而言,都无法与蒋经国晚年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相比。此次“政治革新”是从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蒋经国在会上发表了《迈向胜利的新历程》的讲话。讲话除了重复“三民主义统一中



国”的陈词之外，着重强调国民党“正值多难之秋”，要“不畏环境的艰苦困难与险恶”，要“打破今天所面临的难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将来”。这是蒋经国晚年首倡“政治革新”的前奏。全会根据蒋经国讲话精神通过了《承先启后，开拓国家光明前途》的中心议题案。该案明确指出：国民党“遇到新的挑战，产生了许多亟待革新和解决的问题”，提出“以党的革新结合行政的革新”，“带动全面的革新”。

三中全会之后，蒋经国在多种场合大谈“政治革新”。他在一次国民党中常会上讲，“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国民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惟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他还特别强调：十二届三中全会应是“国民党在作风上的一个分界线，改变过去比较保守的做法”。“在力求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自我检讨，发掘缺点，并以魄力、担当和勇气面对现实，做必要的改革”。

为了大力推行“政治革新”，蒋经国采取了三项措施：

首先在国民党决策机构调整人事。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调整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的人选，将年迈多病的孙运璿、马纪壮、阎振兴与赵自齐除名，增加了李焕、吴伯雄、施启扬、陈履安。4位新人进入国民党中常会，首先使国民党决策机构在年轻化问题上稍有改变。除李焕外，其余3人均在50岁以下，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的年龄比原来降低了两岁。另一方面，蒋经国在提拔新人时，非常注意他们对“政治革新”的态度与学历。4位新人均赞成蒋经国的“革新”路线。

其次，成立“政治革新”小组。蒋经国亲自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挑选出12人，指定严家淦为召集人，专门研究“政治革新”诸项内容与政策。

再次，蒋经国亲自督导“政治革新”案的研拟工作。他说：“虽然全会交下来的案子很多，但要先选择最重要的事做，而且要快做，不